

郑观应：近代“商战论”的主要代表者

汤照连

郑观应（1842-1922），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著名爱国企业家、思想家。主要代表作《盛世危言》，刊行于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在当时流传颇广，影响很大。其最显著的建树，除为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立言、争取政治权利，力倡发展民族新式工商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外，就是明确提出风靡一时的“商战论”，是当之无愧的十九世纪末中国“商战论”的主要代表者。

（一）从向外人学“商战”，到与外人“商战”。

郑观应“商战论”的提出，是与他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的。

郑观应的家乡香山县（今中山市）毗邻港澳，又地处商品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易于具有重商的思想倾向。而他终其一生的商人身份、商人经历，更使这种思想倾向较之一般人士更为强烈和突出。由于科举落第，17岁的郑观应即奉父命赴沪学习经商，从此开始了长达63年之久的经营近代

工商交通企业的生涯。他曾充当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会办，汉阳铁厂总办，以及商办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创办和投资了不少贸易、航运、铁路、金融、工矿等企业。他把自己一生的经历概括为一句话：“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①殊非虚言。

郑观应生活在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时代。作为一个爱国者，他目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深感愤慨和忧虑。为了寻找救国救民之方，他毅然走上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道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坚炮利，而在……使人尽其才，……使地尽其利，……使物畅其流。”^②进而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实行变法，使中国独立富强的改革构想。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重点则是经济问题。

而经济问题的核心,也就是所谓“商战”问题,即主张在国家的保护、扶植下,以商业为中心,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商战”即经济侵略,使中国臻至独立富强。

(二) “商战论”的提出。

任何思想学说的产生,都是深深根植于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同时又有不可或缺的先行思想材料作为其渊源。郑观应的“商战论”也不例外。

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农战”、“耕战”之说。而利用商业特别是对外贸易作为手段以控制别国,则古代《管子》轻重理论已有所论列。但这与我们在此讨论的郑观应“商战论”并无直接关连。

1. 近代西方廉价商品倾销大潮和中国思想界的“重商”思潮。

中国近代“商战论”,是在近代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为了说明这一点,首先有必要对中国近代“重商”思潮作一简单考察。

众所周知,自十五世纪起,特别是新航路发现后,葡萄牙、荷兰、法国或英国先后起而从事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的商业战争。18世纪以后英国最后获得海上霸权,争夺的矛头转向殖民地,既用军事方式也用通商方式以灭人之国。英国对中国进行的海盗式的鸦片贸易,由此对中国发动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其目的就是要在大炮军舰的掩护下,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头上,攫取关税协定、内河航行权等特权,把中国变为他们廉价商品倾销地和原材料取给地,使中国逐步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正因为如此,在19世纪70-90年代间,主张向欧美学习、变法自强的中国的进步思想家们,无不存在着“重商”思想和竭力鼓吹“重商”观点。

2. 外交大员薛福成的“商握四民之纲论”。

薛福成(1838-1894),著名资产阶级改革派思想家,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外交要员。早年曾抱有发展经济必须以“工商为先”^③的观点,并提出“工体商用”、“工基商纲”^④口号。1889年出使四国后,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直接影响下,一时间他的“重商”倾向更为突出。他在1890年出使日记中具体记述了17世纪以来英国对西班牙、荷兰、法国等殖民主义国家先后进行的商业战争,认为西方“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藉于商”。^⑤他进而宣扬“商握四民之纲论”说“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盗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⑥这是中国最早从商与士、农、工相互关系去论证“重商”合理性的一种尝试,尽管颠倒了生产与流通的关系,只把握经济活动的外观。不过也应当看到,这些观点已涉及到“商战论”的具体内容。

3. 洋务“俊才”、著名资产阶级改革派思想家马建忠的“贸易差额论”。

马建忠于1890年所作的《富民说》,相当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典型的“重商”观点。他在讨论国家富强这一论题时,指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⑦又说:“转贫民为富民,民富而国自强。”那么,如何实现民富国强呢?他强调在国家的保护、扶植下,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交通企业,其中尤其是对外贸易。他论证说:国内贸易是“中国之人运中国之货,以通中国之财,……循环周复,而财不外散”;对外贸易则不然,它是可以使一国财富增加或减少的。他认识到西方国家的贸易扩张,是造成中国贫穷的主要原因。他的结论是:“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者亦利,通商而进口

货溢于出口者不利”。又说：“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为此，他提出两条原则：

“一曰使出口货多，则在精求中国固有之货令其畅销”；“再曰使进口货少，则在仿造外洋之货，敌其销路”。马建忠上述关于对外贸易差额与国家财富增减关系的论点，显然很接近西欧晚期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而他所提出的实现出口大于进口即贸易顺差的两原则，又几乎是现代通行的出口替代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这也是“商战论”不可缺少的内容。

4. 王韬“兵力商力并用论”。

王韬（1828-1897），中国著名资产阶级改革派思想家。1867-1870年随英国传教士理雅各（1814-1897）赴英译书，并游历了法、俄等国。1873年起在香港主编《环球日报》，从事著述达10年之久，后返上海定居。以鼓吹“变法自强”而名噪一时。王韬与郑观应关系密切。郑观应曾于1879年将署名“杞忧生”的《易言》36篇本，寄香港向王韬请教。王韬于1880年将此书在香港出版，并为之序。1895年12月康有为去上海组织强学会，郑观应将康有为引荐与王韬。此外，郑观应还多次为王韬任掌院的上海格致书院考生命题，等等。

早在70年代初，王韬认识到中国要实行“变法自强”，就必须着重“求富”，“先富而后强”。而要求富，就必须效法西方，“恃商为国本”。^⑧他以英国为例，阐述“恃商为国本”的含义时，指出英国商人，“远至数万里外，以贱征贵，以贵征贱，取利于异邦”；英之国计民生全恃乎商，而其利悉出自航海”。^⑨把商业特别是对外贸易看作是富国的唯一途径。他鼓吹效法西方“恃商为国本”，以“广贸易”为中心，“开煤矿”、“制机器”、“兴纺织”、“造轮船”、“建铁路”、“设保险”，全面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

在“恃商为国本”的“重商”观点的基础上，王韬进一步明确提出“兵力商力并用论”。他在揭

示英国掠夺殖民地的侵略手法时指出：“盖英之立国，以商为本，以兵为辅，商之所往，兵亦至焉。而兵力之强，全在商力之富，以商力裕兵力。二者并行，而乃无敌于欧洲。”^⑩这就是说，军事不能离开经济，强大的军力是以强大的经济为基础；通商即经济侵略是主要手段，军事侵略是其后盾，是辅助手段。二者结合，无往不胜。在区分“兵”与“商”、“兵力”与“商力”的基础上，王韬对“商”或“商力”即经济侵略的隐蔽性、危害性作了深一层的论述，指明西方国家向外扩张总是由“通商”开始，继以军事占领，把别国变成殖民地。因此，他主张中国反抗外国侵略也应当针锋相对，“兵力商力二者并用，则方无意外之虞”。^⑪这些观点，是后来郑观应所提出的“商战论”张本。

（三）“商战论”的主要内容。

在薛福成、马建忠“重商论”，特别是王韬“兵力商力并用论”的基础上，郑观应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明确提出了“商战”的概念，并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证，使之成为流行一时的响亮口号。

郑观应的“商战论”包含了如下一些特定的论点、政策和措施：

1. 兵战“祸人易觉”，商战“敝国无形”。

郑观应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侵略的方式和手段归结为“兵战”、“商战”与“传教”，并把“兵战”即军事侵略与“商战”即经济侵略加以比较分析，认为后者比前者有更大的隐蔽性和危害性。他说：“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⑫“所以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⑬显然，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侵略与经济侵略的不同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上，郑观应与王

稻是基本一致的,只不过郑观应把二者更明确地概括为“兵战”与“商战”的概念罢了。

2. “商能灭人之国”。

郑观应还进一步揭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商战”的罪恶目的:“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他尖锐地指出:“商能灭人之国”,“英迭为通商而灭人国。”^⑭这表明,郑观应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也从政治上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商战”侵略本质,尽管这种认识带有浓重的“重商”色彩,过分夸大了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的作用。

3. “有形之战”与“无形之战”并举,标本兼治。

郑观应认为,为了有效地对付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必须“兵战”与“商战”兼备,而且后者更为重要。他说:“亟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⑮并进而补充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⑯

4. “以商为本”、“以商立国”。

为了“决胜于商战”,^⑰郑观应提出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观点和战略原则,那就是:“以商为本”、“以商立国”。^⑱意思是在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取向上,应以商业为中心主要出发点,其他各个经济部门与之紧密配合,共同促进商业的发展,并带动其他各个经济部门向前发展。他论证说:“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也。”^⑲这种议论,与上述薛福成“商握四民之纲论”的看法非常接近,只不过角

度相反而已。这种以商业为中心看待国民经济各部门相互关系的观点,反映了郑观应商业资本的立场和商人阶级的意识。

5. “决胜于商战”的政策措施。

为了实现“决胜于商战”的战略目标,郑观应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主要有:

——否定和批判“重本抑末”、“贱商”、“轻商”等封建传统教条,以营造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环境。

——“开议院”,由工商业者中“品行刚方,行事中节者”被公举为议员,^⑳参政议政;“立商部”,其属下“总局”“分局”的“总董”,均由各业工商者公举,“一切商情准其面商,当道随时保护。”^㉑以此提高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发挥他们对于“商战”的积极性。

——废除封建垄断,允许民间自由投资和举办新式工商业,“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㉒

——以商业、特别是对贸易为中心,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同时极端重视发展民族机器制造业,因为“各种机器自能制造,则各种货物自能制造,……不致全以利权授外人矣”。^㉓

——采取“照样仿制”进口畅销洋货和“精制”出口畅销土货的竞争策略,实施所谓“诸物物战”、“食物战”“零星货物战”,“五金煤矿战”以及“玩好珍奇战”等。^㉔

——政府亟须改变“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良法”^㉕的局面,实行扶植、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措施,诸如实行保护关税,废除厘金和出口税,制订和颁行公司法,奖励和实行专利权,制订和颁行商标注册条例,允许商人组织和加入商会等。

——自铸金、银币,以抵制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宁借民债,不举洋债,不得已借洋债,也必须“通筹全局,审慎周详”,利息不能太高,不

能以国家主权作为借款条件。

——“兴学校”，“广学堂”，尤其要注重开办“理工书院”、“工艺书院”和“商务学堂”，以培养各种人才；鼓励多学外文和派人出洋留学，多翻译西方书籍，以培养熟悉西方的专才。

——往外国派遣公使、领事，建立海军，以保护中国商人在国外的合法权益，等等。

（四）简短的评议。

1. 薛福成、马建忠的“重商”观点，特别是王韬的“兵力商力并用论”，是郑观应“商战论”的先行思想材料。郑观应的贡献是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商战论”这一新概念、新思想，而且作了较充分的论证。他既做到兼容，又做到创新，这是难能可贵的。

2. 郑观应的商人身份、商人经历是“商战论”产生的个人内在因素。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处于发轫时期，而西方经济学之传入中国，又是稍晚之事，故出现这种幼稚的“重商”经济观点是毫不奇怪的。西方殖民主义掠夺史和对中国以商品输出为主的掠夺方式，对中国近代新式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极大的威胁。“重商”，其实另一面折射出的是恐商的心理。“商战论”自然也是反映了处于“双重压迫”下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3. 郑观应的“商战论”，虽然曾在甲午战争前后响彻一时，但并未产生多大的实际效果。后来很快又被康、梁“定为国”、“以工立国”的口号和孙中山的“实业救国”新概念所代替了。尽管如此，郑观应“商战论”的提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具有积极和进步的意义的。郑观应把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直接联系起来，把发展新式工商业提到

了国家、民族存亡兴废的高度，揭露了以商品输出为主要手段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罪恶行径，体现了强烈的民族立场和爱国精神。

注 释

-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8，《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郎》。
-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
- ③ 薛福成：《筹洋刍议·商政》。
- ④ 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3，《振百工说》。
- ⑤ 薛福成：《出使日记》，卷2，1890年8月9日记。
- ⑥ 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3，《英吉利利用商务开辟荒地》。
- ⑦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富民说》，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同此。
- ⑧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10，《代上广州太守书》。
- ⑨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4，《英重通商》。
- ⑩ 王韬：《弢园尺牍》，卷9，《上丁中丞》。
- ⑪ 同⑨。
- ⑫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
- ⑬⑭⑮ 同上书，《商战下》。
- ⑯⑰⑱ 同⑫。
- ⑲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
- ⑳ 同上书，《商务二》。
- ㉑ 同上书，《捐纳》。
- ㉒②③ 同上书，《商务二》。
- ㉔ 同上书，《商务三》。
- ㉕ 同上书，《商战上》。
- ㉖ 同上书，《商务二》。